

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

郭伏良

摘要 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几乎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本文在借鉴、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试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五个方面探讨影响建国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促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其中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因素是以往学者较少论及的。

关键词 当代汉语 词汇发展 原因

运动、发展、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形式,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而言,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于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建国以来汉语词汇,特别是一般词汇的历时形态,再次“实证”了这一语言发展规律。本文在借鉴、吸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五个方面探讨影响建国以来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促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一、社会因素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词汇最能体现语言发展的这一特点,可以说,词汇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窗口。下面选取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建国以来社会因素对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1. 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词汇发生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社会这一根本性变革,汉语中表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一些旧词语趋于隐退、消亡,如“党国、参议会、中央军、保长、三青团、中统、军统、租界、巡捕、宪兵、工部局”等等;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词语开始大量产生和运用,如“政协、人大、国务院、党委、公有制、国营经济、合作化、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五保户、敬老院”等等,这些具有新中国色彩的词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当代汉语政治词汇的基础。

2. 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推动新词语的产生。如,新中国诞生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随着一批科技项目的研究和成果问世,五六十年代词

汇中出现了“半导体、电视机、导弹、超声波、航天、火箭推进机、人造地球卫星、原子反应堆”等科技新词。改革开放后,我国进一步确立了“科技兴国”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争创科技成果。新科技的出现、新产品的问世,必然促使大量科技新词的产生。比如,随着计算机科学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汉语中出现了“电脑、软件、硬件、光盘、软盘、硬盘、内存、光驱、联网、网址、上机、电子网络、电子图书、电子词典、电子银行”等等一大批新词语,这正说明:“科学发展到什么时候,就一定会在语言中创造什么样的词语,这样的词语是不可能先于科学实践而出现的。”^①

3. 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引起语言相互接触,促使外来词产生。建国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促使汉语中出现了不少受俄语影响产生的外来词,如“布拉吉”“喀秋莎”“文化宫”“集体农庄”等等。“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占主导地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度落入半封闭的境地,与“外面的世界”处于隔绝状态,外来词几乎无缘产生。70年代末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国门开放,我国与国外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不断增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从欧美国家源源不断而来,形成了汉语史上吸收外来词的又一次高潮,这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在词汇领域的生动反映。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不难看出,社会因素确是推动词汇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研究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密切结合近50年的共和国史,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 本文为河北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汉语词汇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

二、认识因素

词是表示概念的外部形式,如果没有反映客观对象的概念成果,词就不会产生。伴随新事物产生的词,如“超导体、网络、电脑、多媒体、试管婴儿”等,固然也有认识和思维能力的因素在内,但在客观事物不变情况下产生的新词更能体现认识的作用,如“臭氧层”、“氨基酸”、“超声波”等都是早已存在的物质,只是由于科技的发展才逐渐被人们发现、认识而命名。词义,特别是词汇意义与概念都是词的形式所表示的内容,二者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当人们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时,往往会促使词义的深化。比如,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趋于深刻和全面,像“风”“水”“电”“地震”这些词,如果拿《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与《国语辞典》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更为准确、科学。熟语的意义容量比一般词语要大,因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熟语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例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熟语的出现,表现了人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而“天字出头夫作主”、“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旧熟语的隐退,则表现了人们对落后的封建主义婚姻观念的摒弃。

三、语用心理因素

1. 求雅心理,主要体现在粗俗语的摒弃和委婉语的使用上。如50年代初,人们用“后进”婉称进步慢、水平低的人或集体;用“荣誉军人”尊称伤残军人。“文革”期间,求雅心理受到冲击,甚多粗俗不雅的词语充斥于人们的言语之中,如“臭老九”“狗崽子”“砸烂狗头”等等。改革开放后,通过“五讲四美”活动,全社会越来越以谈吐文雅为荣,比如,过去将智力低下的人称为“傻子”“呆子”“低能儿”等,现在则用“弱智者”一词;对人体生理、功能上存在的缺陷或障碍,过去用“残废”,后用“残疾”,现在还出现了“伤残”一词;又如现将“聋子”多称为“失聪人”,“瞎子”多称为“失明人”,“侏儒”多称为“袖珍青年”等等。

2. 求新心理,首先表现在为了新颖、突出时代感对事物重新命名上。如现在更多地使用“信息”而少用“消息”、多用“走势”而少用“趋势”、多用“构想”而少用“设想”、多用“层面”而少用“层次”等。其次,在求新赶时髦的心理支配下,还引进了不少在汉语中有相应语言成分的词,如“的士”“小巴”“镭射”等,这说明“有时候一种语言并不缺少相应的部分,但是宁可借用外来的语言成份,并且最终用它取代固有的相应成分……语言的借用,有时并

不是出于表达新事物的需要,而是出于仿效时髦的趋新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人们在民俗上追求时髦可以类比。”^②

3. 求简心理,齐夫定律“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就是最短的词”,充分揭示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上的求简心理。在求简心理驱使下,建国初就新造了不少简缩词,如“镇反、肃反、整社、劳保、反右、三反、五反”等等;六七十年代也相当不少,如“四清、社教、农转非、三突出、三忠于、四无限、工宣队”等。改革开放后,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原则更为明显,简缩词大批涌现。许多过去不太简缩的语言形式,在高效率交际和求简心理的双重作用下也纷纷简缩了,如“空姐”(空中小姐)、“社科”(社会科学)、“人流”(人工流产)等,现在已普遍使用。在并存的同义形式中人们往往选择音节简短的,这也体现了求简的语用心理,如音译的“雷达”、“艾滋病”都取代了它们冗长的意译形式“无线电测距仪”“后天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以外文字母或以外文字母与汉字组合为书写形式的新词语,如“CT”“BP机”等之所以被人们喜欢使用能在汉语中立足,也是与它们各自的意译形式相比具有更简捷的优势。

四、语言政策因素

语言政策既是对语言实践规律性的总结,又是运用语言时应该遵循的法则。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制订了汉语规范化政策。这一政策既符合全民族交际生活的需要,又符合汉语历史发展规律,因而成为促进汉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词汇规范化的制订和实行,五六十年代的“书面语,报刊或成本著作,文艺作品或科学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了用词造句的规范。有的语言刊物特地开辟‘语文短评’一栏,专门评改某些违反语言习惯的现象。”^③“文革”时期,词汇规范化政策受到破坏,在言语交际中,粗话、空话、大话泛滥,有些词语的褒贬色彩也奇特地发生突变,如“造反”一直是贬义或中性词,在这一时期却被赋予了褒义色彩,而“本来是中性词的‘秩序’、‘平和’、‘稳定’却被赋予了贬义的‘死水一潭’、‘一统天下’的含义。”^④“四人帮”还声称“所有的词语都含有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进而把所有的词语都分成“积极的”与“消极的”、“革命的”与“反动的”、“红色的”与“黄色的”两类,限制使用所谓“消极”、“反动”、“黄色”的词汇。在“词汇有阶级性”的错误理论影响下,致使相当数量的普通词语处于禁用状态。无独

有偶,“德国的纳粹时期也曾出现过语言专制主义……例如,帝国新闻社于1937年宣称“废除 Volk-erbund(国际联盟)一词,借以反对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的国际联盟;1939年又宣称 tapfer(勇敢)一词只能与 deutsh(德意志)一词搭配使用……这些所谓的‘语言规范’,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群众基础,根本无法推行,成为历史上的笑话”^⑤。“文革”结束后,汉语规范化工作逐渐得到恢复。1986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就是最重要的两项。在这一时期,规范化的理论与研究得到深入开展,如各类语文报刊大多开辟了规范词语应用的专栏,《中国语文》杂志社和出版社编出了《词语评改五百例》、《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400例》等规范词汇的指导书籍,特别是50年代编纂1978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1996年修订本为正确使用词语提供了权威依据。新时期词汇规范化工作具体表现在:(1)对不文明、不健康、不标准的用语现象进行批评和限制。如,有的学者对几乎通篇用吴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提出了批评,指出“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更不应该滥用方言”^⑥。再如自1995~1996年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驳回了有不良文化倾向的商标注册申请如“春宫、二房、大地主、帝国、黑手党”等50多件(据《报刊文摘》1999.6.24)。(2)对有积极作用的语言变异现象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例如新时期始,有人指责“空姐”“计生”等词不规范,现在,“空姐”一词已得到认可,被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修)》,“计生”虽未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修)》,但已被广泛使用。又如“的士”“收银台”,以其发音简洁、富有时代气息而被人们接受,允许它们与普通词“出租车”“收款处”并存。

总之,新时期的规范化工作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更为科学、客观及有一定弹性,人们更多地从动态的角度来探讨规范化问题,认识到语言学家既不应只跟在后面描写、毫无作为,也不应充当语言警察,脱离实际,任意评点,规范化的目的在于使词汇的发展既健康规范又丰富活跃。

五、词汇系统因素

词汇系统本身对词汇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词汇是以数以万计的词汇成分聚合而成的开放性系统,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是比较弱的,因而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另一方面,词汇成员毕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处于语音、语义、结构、功能各方面的联系之中,在这种种联系之中,词汇

成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着词汇的发展。下面举例说明。

“食油”和“石油”是一组同音词,由于在口语中容易发生听觉上的混淆,所以“食油”就改换成“食用油”以资区别。类似的还有“邮票”和“油票儿”(后者加以儿化以资区别)、“期中”和“期末”(后者改为“期末”以资区别)。

“病院”和“医院”原是一组等义词,后来词义出现了分化,“病院”成为指“专治某种疾病的医院”的专称,如“结核病院”“精神病院”等。等义词调整的另一种情况是淘汰,如“智齿”和“智牙”、“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数码”从前都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修)》中每组的最后一词都被删减。

“近视”和“远视”,在《国语辞典》中只收有它们的原义。《现代汉语词典》中“近视”有了“比喻眼光短浅”的新义,受“近视”比喻义的影响,“远视”起了连锁反应,也增加了相对的比喻义“眼光远大”,并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修)》中。

“ABC”在英语中有三个义项:①字母表;②基础知识;③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时刻表。而进入到汉语词汇中,由于受到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只保留了第二个义项。

以往在分析影响汉语词汇发展因素时,多是从社会方面着手,从词汇系统内部方面探讨的较少。而“这种分析,对词汇、词义系统的说明很有价值。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领域。”^⑦

以上,我们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词汇系统五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建国后影响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其实,词汇发展变化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何把影响词汇发展变化的这些因素更加细致地揭示清楚,是今后词汇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任务。

注:

- ①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 ②游汝杰:《文化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 ③武占坤等:《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中国语文》1959年第7期。
- ④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 ⑤冯志伟:《德语的规范化》,《语文建设》1992年第3期。
- ⑥于浦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更不应该滥用方言》,《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2期。
- ⑦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文系)